

福耀科大“自负盈亏”实验：改革价值与大学边界

■张端鸿

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在接受采访时证实,福耀科大理事会理事长曹德旺要求学校各院系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做到“自己养活自己”。王树国回答的话很直白,也很有冲击力:如果一个院系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它没有真本事;如果研究的是真问题,又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这番表态很快引发高等教育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大学“等靠要”惯性、倒逼科研面向真问题的一剂猛药;质疑者则担心,大学一旦自负盈亏的逻辑牵引,就可能把学术价值简单折算为市场收入,最终使大学变成企业研发部门的延伸。

我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复杂一点。福耀科大的院系自负盈亏,既不应被简单否定,也不宜被过度神化。它是一条逻辑自治、条件特殊、边界清晰的新型大学发展路径。它的意义在于,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观察“应用导向大学如何真正嵌入产业体系”的制度样本;它的风险在于,这一路径如果被误读为所有大学都应遵循的普遍范式,就会对高等教育生态造成新的伤害。

自负盈亏背后的“问题导向”机制

曹德旺提出“自己养活自己”,表面上看是经费逻辑,实质上是评价逻辑。它真正要问的是,一个院系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回应真实的产业需求,能不能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能不能形成可转化、可应用、可验证的技术能力。

传统大学科研评价主要依赖同行评议、论文发表、项目立项、奖项成果等学术共同体内部机制。这套机制有其必要性,它保证了知识生产的专业性和学术判断的相对独立,但长期运行下来,也确实容易形成一种“内部循环”。

福耀科大的做法恰恰是从另一端嵌入一把尺子:研究不能只对论文负责,也要对真实场景负责;不能只在学术话语中成立,也要在产业系统中经受检验。

这一点与福耀科大的定位高度相关。该校从创办之初就不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是一所面向产业需求、服务先进制造、突出应用研究的新型大学。它天然连接制造业现场,能够更早感知企业的技术痛点,也更容易围绕关键共性技术组织科研攻关。

因此,在福耀科大这样的制度场景中,自负盈亏并不是简单把企业逻辑强加给大学,而是把产业信号嵌入大学治理结构。它真正倒逼的是教师和院系从“做过什么研究”转向“解决了什么问题”,从“发表了多少成果”转向“形成了什么能力”,从“能否在学术系统中被认可”转向“能否在真实生产场景中被需要”。

这对应用型工科而言,具有明显的改革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一些工科院系并不缺论文,也不缺项目,但距离产业现场并不近;不缺概念,也不缺方案,但与工程实现还有很长

距离。福耀科大的机制把教师推到真实问题面前,把院系推到真实竞争环境中,这种压力未必舒适,却可能有效。

“真问题”不等于“能变现的问题”

王树国那句“如果研究的是真问题,又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虽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也隐含着需要一个辨析的前提:真问题是否必然能够带来市场回报?在应用工程领域,这个判断大体成立。然而,如果把“真问题”扩大到整个学术体系,就会出现明显偏差。许多基础科学中的理论突破都是真问题,但并不直接养活一个院系,价值也未必能通过市场收入直接体现。即使在工科内部,也并非所有真问题都能及时变现。

如果院系被过强的自负盈亏压力牵引,最理性的选择就可能是追逐周期、可交付、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投入长周期、高风险、不确定性强的探索。

因此,必须承认市场是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市场不是学术价值的唯一裁判。市场能够识别“现在有需求,马上能付费”的问题,却不一定能识别“今天看不见,未来很关键”的问题。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企业,恰恰在于它不仅要解决当下可见的问题和人才,也要为尚未出现的问题储备知识、方法和人才。

如果把“真问题”简单等同于“能变现的问题”,大学就会失去一部分最重要的功能。真正成熟的大学治理,不是用市场逻辑替代学术逻辑,而是在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之间建立适配机制;应用研究可以深度接受市场检验,基础研究则必须保留相对独立的探索空间。

大学与产业研究院的边界

福耀科大引发争议的真正焦点不只是院系能不能自负盈亏,而且是究竟要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如果该校的定位是“大学形态的产业研究院”,那么自负盈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一种制度上的诚实。然而,“大学”这个名称本身承载着更复杂的制度期待。它既要服务产业,也要超越眼前产业;既要回应现实需求,也要保留自由探索;既要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也要培养具有完整知识结构、社会责任和公共判断力的人。

这就带来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福耀科大究竟是一所高度产业化的新型工科大学,还是一所具有完整大学功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如果是前者,院系自负盈亏逻辑相对清晰;如果是后者,就必须为基础学科、通识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和长期探索研究安排制度空间。

王树国以该校联合企业自主研发出超高精度贴装生产线为例说明机制有效,这个案例很有说服力,但也恰恰说明了适用边界。它属于典型的应用工科研发,需求明确、对象清楚、转化路径相对直接。可是,如果未来福耀科大要建设

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基础学科,甚至要配置经济、管理、法学等支撑性学科,这些学科是否也要自负盈亏?如果要,它们如何养活自己?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应存在?如果不要求自负盈亏,那么不同学科之间的治理逻辑又如何区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耀科大模式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要引入市场机制,而在于它能否清楚划定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哪些院系应当更好地接受产业检验?哪些研究应当允许长期投入?哪些公共性学科需要学校整体托底?这些边界如果不清楚,自负盈亏就容易从改革工具变成治理压力。

不能泛化为高教改革的统一模板

福耀科大的制度实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它自身是否可行,而是它会不会被简单包装成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方向。

近年来,应用型高校转型、产教融合、破“五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推进,其共同指向都是改变大学相对封闭的运行方式,增强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在这样的政策语境下,福耀科大模式很容易被解读为改革先锋;不等财政、不靠编制、不做空转研究,直接面向产业、面向市场、面向真实问题。

这个方向有其积极意义。中国高等教育确实需要一批更加贴近产业、更加擅长转化、更加敢于组织工程攻关的新型大学。然而必须看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不是单一生产线,而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不同类型高校有不同任务,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校。

如果把“院系自负盈亏”作为普遍改革方向,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基础研究会被压缩,长周期探索会被边缘化,人文社会科学会被低估,大学内部学科生态会被重新改造成“谁能赚钱谁重要”的结构。若所有院系都被要求直接自我造血,大学就会越来越像项目、公司,而不再是大学。

福耀科大模式之所以可行,恰恰因为它具备特殊条件:它是一所新创大学,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它定位集中,不追求综合性学科全覆盖;它有强产业背景和企业资源支持;它从一开始就围绕先进制造组织学科与科研。正因为这些条件特殊,才不能把它简单复制到所有高校。要求一所运行了几十年、承担多重公共职能、拥有完整学科体系的公立大学突然全面自负盈亏,那不是改革,而是拆解。

市场逻辑进入大学后如何设边界

与其争论福耀科大的自负盈亏是对还是错,不如追问几个更实质性的问题。

首先,基础研究的空间如何保留?即便福耀科大高度面向产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基础研究。先进制造的背后,是材料、力学、控

制、信息、数学、物理等基础能力。如果所有资源都流向短期可转化项目,学校早期可能取得亮眼成果,但长期创新后劲就会不足。因此,福耀科大需要回答:是否为基础性、前瞻性、长周期研究预留不被市场收入直接考核的空间?这部分经费从何而来?如何评价?规模多大?谁来决定?

其次,学科生态如何构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只由若干产业项目组成。它需要基础学科支撑,需要通识教育支撑,需要管理、法律、伦理、社会科学支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芯片产业等领域,技术问题往往也是组织问题、伦理问题、治理问题和制度问题。福耀科大如果只强调工程转化,而忽视这些支撑性学科,人才培养就可能出现结构性短板。

再次,教师的学术自由如何保障?自负盈亏机制会强化教师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但学术创新往往来自非共识方向的坚持。很多突破早期不被市场理解,也不一定被企业需要。如果教师只能做企业当下愿意付费的问题,就很难孕育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

最后,成果评价如何避免新的单一化?过去我们批评“唯论文”,并不是为了走向“唯变现”。如果把论文数量换成转化收入,只是用一种单一标准替代另一种单一标准。即便在应用导向大学中,评价也应当是多维的:既看经济回报,也看技术难度;既看市场收入,也看社会效益;既看短期转化,也看长期能力;既看单个项目收益,也看学校对产业体系的系统贡献。

真正成熟的高教改革,不是把大学从一种单一评价推向另一种单一评价,而是让不同类型大学、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活动拥有相匹配的评价逻辑。能转化的,就鼓励转化;该长期积累的,就允许长期积累;需要公共投入的,就由公共资源托底;适合市场检验的,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总之,福耀科大院系自负盈亏,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次值得关注的制度实验。它用最直白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大学科研到底应当为谁服务,大学院系到底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应用型工科和产业技术攻关领域,市场信号确实比单纯论文评价更直接,也更能倒逼研究回归真实问题。曹德旺以产业家的经验和直觉设计这一机制,在福耀科大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

因此,福耀科大模式值得尊重,但不宜神化;值得观察,但不能泛化。它可以成为新型应用研究型大学的一条特殊路径,却不能成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统一模板。对该校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它能否让工科院系实现自我造血,而是能否在强市场导向之下,仍然为那些暂时不赚钱但长期重要的研究,为那些不直接变现但支撑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学科,保留一片制度空间。

这片空间是大学与企业、大学与产业研究院之间最根本的分界线。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大学生“回炉”技校：不是学历降级，而是能力重构

■冉云芳 李灵悦 褚轩敏

正值高考志愿填报季,“选学校还是选专业”“读本科还是学技能”等话题再次引发关注。与此同时,一个颇具反差感的现象也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高校毕业生选择进入技工学校学习技能课程,这被称为大学生“回炉”技校。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学历层级”理解教育选择,考大学被视为“向上走”,进技校似乎意味着“向下走”。因此,不少人会追问:读了大学,为何还要进技校?学历是不是不值钱了?

若将视角从学历层级转向岗位能力,从学校名称转向产业需求,从一纸文凭转向真实工作场景,就会发现大学生走进技校并不宜被简单理解为“学历倒退”,更不应被贴上“教育失败”的标签。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市场之间仍需衔接的关键环节。

现象：从个体补技能到制度化培养

大学生毕业后进入技校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鲜事。早在21世纪初,一些地方就有高校毕业生通过去技校补技能、考证书、学实操的案例。只是过去,这更多是个体在求职受挫后的自我调整;近几年,它开始表现为更清晰的制度安排和培养模式。

例如,今年北京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项目,全日制班采取“1年在校学习+1年企业实习”模式,毕业时可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推荐就业。浙江、广东等地也探索面向高校毕业生的预备技师班、技师定向培养等做法。换言之,大学生进技校已不再是个体求职受挫后的临时选择,而成为部分地方促进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的一种政策工具。

将这一变化置于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高位运行的背景下来看,其含义更加清楚。教育部信息显示,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同时提出指导高校根据产业需要增设一批“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帮助毕业生快速提升就业能力。大学生进技校并非简单的“专升本”或“学历降级”,相反有利于学历教育之后

的技能增值。两者如果有效衔接,带来的不是教育层次倒退,而是能力结构重组。

根源：学历逻辑与能力逻辑的深层错位

大学生“回炉”技校,表面看是个人选择,深层反映了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评价体系的变化。若仅将其归因于就业压力或个体能力不足,便难以触及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更准确地说,它反映的是当下以学历为中心的传统错位逻辑与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能力逻辑的错位。

首先,从就业市场看,学历信号正在弱化,岗位能力正在显化。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大学学历仍然重要,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也不再天然等于胜任岗位的能力。以往企业招聘多以院校、专业、学历作为评判标准,如今则更看重毕业生实操能力、项目经验、工具运用与现场问题解决能力。而在这套评价体系下,许多大学毕业生仍存在短板。

其次,从高校培养看,课堂知识与岗位能力之间存在转化断层。不少高校课程仍按学科逻辑展开,重概念、原理、考试和论文;企业岗位则按工作过程运行,重任务、流程、标准、协作和结果。学生在校期间并非没有学习,但所学知识没有充分转化为可展示、可评价、可使用的职业能力。有些实践教学虽然设置了课时,却缺少真实任务场景。课堂与岗位之间,隔着一堵难以打破的“转化之墙”。

再次,从产业发展看,技能内涵正在从单一操作转向复合能力。今天的技能岗位,早已不是简单重复的体力操作。今天的技能人才所强调的“会动手”,意味着会读图、会判断、会协作、会使用数字工具、会按标准解决复杂问题。换言之,技能不再是知识的低端形态,而是知识进入产业现场后的实现方式。

最后,从社会观念看,单一学历阶梯仍然影响成才评价。现实中的人才成长,越来越要求多维组合:理论基础、技术技能、实践经验、数字素养、职业认同等要素共同构成一个人的发展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回炉”技校是教育生态的一次自我调节。当原有学历路径无法提供足够的岗位资源和职业机会时,大

学生通过补技能、调目标、重组发展路径,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空间。真正需要反思的,不只是学生为何“回炉”,而且是因为一些本该在培养过程中完成的能力训练,被推迟到了毕业之后。

路径：从事后补课转向全过程能力建构

大学生“回炉”技校具有现实合理性,应予以积极肯定和政策引导,但不能因此将其简单理解为一条普适路径。“回炉”意味着学生要投入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若项目设计粗糙,只是将大学生简单放进普通培训班,或者只鼓励短期考证而缺少真实设备、真实项目、真实导师和真实就业评价,就可能产生新的形式主义,使学生再次陷入“证书很多、能力不实”的困境。

因此,政策重点不在于讨论大学生该不该去技校,而在于引导、规范并将这一技能再提升需求纳入制度化轨道,纳入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体系,使技能补强从毕业后的个人补救,转变为大学期间与离校后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

一是加强跟踪调研与示范推广,形成正向政策导向。对大学生技师班、预备技师班、短期技能培训班和企业订单班等项目,应持续摸清真实需求和实施效果。对企业参与深、就业效果好、社会认可度高的项目,可开展示范推广。同时,加强宣传引导,纠正将大学生进技校简单理解为“学历降级”“就业失败”的片面认识。对适合参加技能提升的高校毕业生而言,进技校补技能、强本领、接岗位,不是丢人行为,而是适应产业变化、拓宽发展道路的务实选择。

二是建立分类供给机制,让技能提升更精准。不同大学生的需求各有侧重,不能千篇一律。对专业基础较接近岗位、只缺少实操经验的毕业生,可提供几周至半年的短期技能培训;对跨专业转向技术岗位、需要系统训练的学生,可设置1至2年的大学生技师班或预备技师班;对已经就业但需要转岗升级的毕业生,可开设夜间班、周末班、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块化课程。这样既能减少学生时间成本,也能避免培训供给“一刀切”。



尤小立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自从2018年11月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发布开展“破五唯”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来,“破五唯”中改革力度最大的当数破“唯论文”。此后,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和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也都与此有关。这些文件主要针对的是论文评价上的非学术化倾向以及“唯SCI”,并将其指标化、僵量化量化的做法。由此可见,论文所肩负的改革任务最为明显。

目前,大学在具体政策实施上虽未完全祛除痼疾,但诸如普遍实行的论文“代表作”制等举措,较之以往更具有学术评价的意味,单纯追求论文数量的倾向也得到了一定改观。

然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出现的两种倾向也在影响改革的持续深入。一种倾向是淡化论文的重要性,另一种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否定论文的价值。

淡化论文重要性通常是以“改革”的名义出现的。在一些管理者看来,既然要破除“唯论文”,就将论文作为晋升职称基本门槛的“唯一指标”转变成“指标之一”,以减轻论文的权重。但论文从“唯一”到“之一”,不仅不能真正做到“破五唯”,反而可能片面地抬高另外“四唯”的地位。因为在现实的评价中,“唯论文”与“唯帽子”“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的“四唯”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在削减“论文”权重的同时,不限制其他硬性指标,后者的权重必然会相应增加。结果就是,当“唯论文”一项被矫正后,另外“四唯”的重要程度却在增强。

从“五唯”的产生和近30年的演变看,此类指标是一项项慢慢堆积起来的,围绕这几项指标的缓慢也经历了由简单到繁复的过程。因此,“破五唯”的改革必然要删繁就简,否则“五唯”之上又添新规,等于叠床架屋,给改革的机车增加额外“配重”。

论文对于文科教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理工大类教师的科研工作来说,大部分思考、付出、学术贡献最终往往需要通过论文等形式予以呈现。这本身就是科研工作以及基础性研究的特点。而其他的“帽子”“奖项”等都只是成果的社会衍生物,它们在诸如教师职称晋升中应该只是“参考”,而不是“必需”。因此,突出“代表作”的权重,实际上就是一种删繁就简的做法。

不过,当下大学教师的组成仍有多种类型,“一刀切”地以论文“代表作”作为评价标准并不合适。分类评价,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有其合理性。但这样的合理性只是建立在“从实际出发”上,并不意味着否定论文的价值和作用。

实际上,破除“唯论文”的本意是为了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和过度关注期刊级别,让论文回归学术层面,以内容和贡献为重。因此,破除“唯论文”并无否定论文之意。但是,一些注重应用的学者却以破除“唯论文”为名,进一步贬低和否定论文的价值。

客观地说,论文的种类繁多,或偏向理论,或偏向应用,或者二者兼顾。这也意味着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如果仅仅以“无法进行成果转化”为由否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必然会顾此失彼、失之偏颇。

而大学与科技公司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肩负着理论创新的使命,后者则主要考虑科技的社会价值和商业利益。这属于正常的社会分工。不过,现在像华为、DeepSeek等国内顶尖的高科技公司在产品研发成功之初,往往率先在科技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大学却要放弃自身的基本定位,向普通科技公司靠拢,这却不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而是弄“长”用“短”,自损功力。

大学曾经流行的“顶天立地”一说,对作为整体的大学是合理的,却未必适用于作为个体的教师。因为“顶天”,即致力于“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其成果并不能马上应用或服务社会。而“立地”讲究成果应用和服务社会,可以说是对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这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作品。

在现实中,没有哪位个体可以同时兼任管理者、研究者、设计师、生产工程师、推广人、销售员,即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天才”也不行。作为个体的教师,只能发挥所长,要么“顶天”,要么“立地”。所以,绝不能为了强调“立地”,用“成果转化”来硬性要求所有教师,更不能以成果转化产值来否定理论研究的载体——论文的价值。

论文的评价向“学术贡献”回归,需要政策措施的保障和同行评价机制的完善,也需要相应的舆论氛围。如果媒体上充满了在“顶刊”及其“子刊”发表论文的报道,却少有实际学术贡献的解读,注重外在包装的风气就不能扭转。

从改革“唯论文”入手“破五唯”的路径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不能以牺牲论文的价值来换取形式上的“改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论文恐怕无法承载那么多的改革负担。

破除「唯论文」并非否定论文价值

(作者单位为苏州大学高校毕业生就业大数据研究与智能决策实验室;本文系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供给与学生需求适配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X2026102850015)的成果之一)